

目 录

序 一	杨 堃 1
序 二	陈永龄 4
第一章 导论：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1
第一节 民族学的定义及其学科地位	1
第二节 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认识	10
第三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现状	18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	33
第二章 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	38
第一节 中国古史中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载	38
第二节 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47
第三节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努力	55
第四节 外国人在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研究	61
第三章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介绍	73
第一节 最早的民族学译著与民族学观点的介绍	73
第二节 利用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79

第三节	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初期活动	84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萌芽时期的特点	97
第四章	中国民族学的创建	102
第一节	蔡元培与《说民族学》	102
第二节	民族学的最早专门研究机构	107
第三节	最早的民族学实地调查	111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118
第五章	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探索	123
第一节	为发展民族学而进行的理论介绍	123
第二节	学科理论的百家争鸣	131
第三节	人文区位学与功能学派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	139
第四节	多种学派的出现	145
第五节	中国民族学的三大研究区域	160
第六章	中国民族学各项工作的初步开展	167
第一节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	167
第二节	中国民族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185
第三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民族学的教学活动	189
第四节	民族文物的搜集和整理	203
第五节	民族学的调查方法与全国风俗调查的设计筹备	210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215
第一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向西部的转移	215
第二节	抗战时期对西北的民族学的调查研究	223
第三节	抗战时期对西南和华南的民族学田野调查	229

第四节 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	
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243
第五节 沦陷区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	250
第八章 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	257
第一节 综合诸学派思想的思考与实践	257
第二节 民族学与现实问题研究	263
第三节 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	276
第九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学	291
第一节 对于调查成果的整理和总结	291
第二节 处于动荡局势中的民族学的发展	298
第三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结局	313
第十章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及问题	318
第一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	319
第二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经验	322
第三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327
第四节 早期中国民族学对以后学术发展的影响	331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334
附录二 主要参考期刊目录	372
附录三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学术简历	375
附录四 中国民族学大事记 (1895—1949 年)	413
附录五 索引	441
后 记	458

CONTENTS

Preface 1	Yang Kun	1
Preface 2	Chen Yongling	4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ssue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Section 1 Ethnology, its definition and disciplinary position		1
Section 2 Perception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10
Section 3 Status quo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18
Section 4 The stages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33
Chapter 2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Section 1 Ethnographic record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38
Section 2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ical discipline in the West		47
Section 3 The endeavors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China		55
Section 4 Early ethnological studies by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a		61
Chapter 3 Early Introductions of Ethnology into China		
Section 1 Early translations of ethnological works and introductions of ethnological opinions		73

Section 2	Employing ethnological theories to expla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79
Section 3	The initial undertakings of ethnology and relevant disciplines in China	84
Section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bryonic ethnology in China	97
Chapter 4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102
Section 1	Professor Cai Yuan – pei and his “On Ethnology”	102
Section 2	The earliest institutions of ethnological studies	107
Section 3	The earliest ethnographical fieldwork	111
Section 4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118
Chapter 5	Prob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123
Section 1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s to ethnology	123
Section 2	Disputes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he discipline	131
Section 3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rea studies and the Functional School	139
Section 4	The rise of diverse schools	145
Section 5	Three major ethnological bases in China	160
Chapter 6	Unfolding the Branches of Ethnology in China	167
Section 1	Extensive fieldworks	167
Section 2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of Ethnology in China	185
Section 3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189
Section 4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relics	203
Section 5	Ethnograph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design of “National Folk Customs”	210
Chapter 7	Ethnolog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215

Section 1	The westward shift of ethnological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s	215
Section 2	Ethnological fieldworks in Northwest China	223
Section 3	Ethnological fieldworks in Southwest China	229
Section 4	Contributions by ethnolinguists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to ethnology	243
Section 5	Ethnological research and fieldwork in the Japanese occupied area	250
Chapter 8	The Sinicization of Ethnology	257
Section 1	Synthetic contemplations and practices	257
Section 2	Ethnology, social practices in China	263
Section 3	Initial effort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ethnology	276
Chapter 9	Ethnology in China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	291
Section 1	Collections and summaries of previous fieldwork Achievements	291
Section 2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during social turmoil	298
Section 3	The outcome of ethnology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313
Chapter 10	Characteristics and Questions of Chinese Ethn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318
Section 1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logy	319
Section 2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thnology	322
Section 3	Main qu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327
Section 4	The determinate effects of the early trajec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leading to its later development	331
Appendix I	Bibliography	334

Appendix II	Major Journals as References	372
Appendix III	Profiles of Chinese Ethnologis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375
Appendix IV	Chronicle of Events in the Ethnology of China 1895 – 1949	413
Appendix V	Index	441
Postscript and Acknowledgments		458

第一章

导论：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民族学史，是以民族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的。这里主要指近百年来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社会或人文科学学科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了更清楚地进行阐述，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民族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加以简略的说明。

第一节 民族学的定义及其学科地位

现代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起源于西方，中国的现代民族学最初也是由西方传入的。然而，

0005996

到目前为止,由于学术研究的传统不同,各国学者对民族学下的定义也不尽一致。限于我们的研究主题,难以对国外学者纷繁的民族学定义一一枚举,若采取概括的办法,进行大致的分类,我们认为有三种主要的看法:其一,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分析和有系统地解释文化资料,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持这种观点的多数是欧美学者。其二,主张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一切现存的和过去存在的民族都在民族学研究之列。前苏联学者过去多数持这种意见。其三,提出民族学是从群体观点去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与生命史的科学,强调文化史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国内外侧重历史研究的民族学家中的部分人主张此种意见。中国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他们基本上偏向第一种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大陆学者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多数人主张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认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①。“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特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②另外,还有人认为它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种情况到1980年以后逐渐有所改变。20世纪80年代前期,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版,32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② 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已经有一些学者主张：“民族学是研究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①在当时拟订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也将狭义的民族学之后加上了一个括号，注明即文化人类学。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民族学的定义进行修正，不仅将民族学作为文化的载体，而且明确地加上了文化的内容。

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讨论中国民族学史时必须涉及的问题。所谓民族学，按目前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大致上与文化人类学等同。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认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彼此间也经常互相通用。”^②杨堃的看法与此类似，认为若就学科本身来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应指一门学科而言^③。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运用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多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直到现在，美国学术界多数人主张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的文化人类学与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有相当大的同一性。

中国部分学者还有另一种意见，即认为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或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用这种体系划分民族学的范围的方法，实际上是美国部分学者的意见的翻版；作为当代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意见，它反映了美国学术队伍

① 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载《民族研究》，1981（1）。

②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1版，1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③ 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的部分实际^①。不过，即使在美国也有人主张：“在民族学家和文化或社会人类学家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范围之差异可能由于用字不同而产生，但因二者过于重叠以致难于把它们分开。”^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也将民族学作为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③。虽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有相当强的考古学实力，然而，从总体上来看，由于考古学、语言学在中国已经成为比民族学更发达的独立学科；直至今日，在我国大部分地方的科研单位和学者，并不具备将语言学或考古学整个学科完全容纳于人类学之中的实力和现实条件。中国悠久的历史，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并使之在中国大有作为；因而，很多大学将考古学专业多设于历史系中，或单独设系。中国的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和音韵学、训诂学结合的产物，语言学除少数单独设系者外，多数分散在中文系、汉语系或其他语言文学系中。考古、语言方面的人才分布情况也大致如此。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只是在研究中利用考古学和语言学方法，而不能囊括这两个学科。因而，美国人类学家在考察中国实际后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中很少能看到有像美国人类学系内的惯常那样，在一个系内的专家群中全面拥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

① 参见 Ember, Carol R. & Ember, Melvin (C. 恩伯、M. 恩伯) *Cultural Anthropology*, 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1版，9~1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② Titiev, M. (M. 蒂提也夫)： *The Science of Man*, (《人的科学》)，New York, Henry Holt, 1954, P.329.

③ 参见 Murphy, Robert F. (罗伯特·F·墨菲)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1版，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四个方面的专家。”^①

在研究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时,民族学经常是“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凌纯声认为,“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②在当时我国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民族学大学教科书《文化人类学》中,林惠祥认为:在欧洲大陆民族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这一名称在英美也很盛行,其意义与欧洲大陆无别,而与文化人类学可通用。在英美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因而,他将三个名称的关系标列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③。

江应樑指出: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之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及文化。但老派的人类学家,仍坚持主张人类学只能研究人的本身及人种的学问,至于人类的文化,应另立一门学科来研究。于是又产生了“民族学”这门学科。在英、美等使用英语的国家中,人类学研究者是把民族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部门,即“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则把民族学划在人类学之外,把对本国以外的欠发达民族及殖民地民族的研究称为“民族学”,对本国的民族、民间知识的研究则称为“民俗学”^④。

从实践上看,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设有民族学组,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则设有人类学及民俗学组。当时,前

① Rossi, A. S. (A. S. 罗西):《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1985。

② 凌纯声:《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八七三号,1932-12-21。

③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版,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④ 参见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

者研究各民族文化，后者除部分研究民族学之外，基本上以研究体质人类学为主，不久就与考古学同置于一组，乃至实际上撤消。以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改为其第四组，并且增加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始改为人类学组。在其基本介绍中，仍自称其研究对象是文化与体质并重。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之后，体质人类学部分分出，又恢复民族学组名称^①。由此，亦可看出当时学者们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关系的一般见解和认识。台湾中央研究院后来建立的民族学研究所，仍秉其传统。近几年来，大陆一些研究机构同时挂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块牌子，亦是类似的举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学在中国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语。

不过，由于大陆民族学一度受到前苏联的民族学的强势影响，并主要围绕民族工作的任务开展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当代中国部分学者对民族学的认识和文化人类学略有一些区别，同时“民族”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歧义性，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所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出现了一些小的差别。

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较为接近。由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都出现得较晚，当这两个学科在西方分化已经逐步扩大之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社会学和民族学相互渗透，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两个领域，不易简单地划定到底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中国学者在这两个学科发展初期，分工不明确，兼容并蓄，时常在实际中表现出交叉或相近关系，有时甚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636（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至是同一的。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他们研究的课题往往涉及两个学科,他们的一些著作既被视为民族学杰作,又被列入社会学书目。由于西方社会学多侧重于研究本国工业社会,而19世纪前半期西方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则多研究异民族,中国和西方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作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著作,被西方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化人类学著作。杨堃认为,解放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①。

不过,我们认为,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研究角度、出发点和归宿上都有差异^②。所谓民族学,并非少数民族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汉族,到中国就成为主体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边疆,在研究对象上很难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完全分开。有些学者主张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分工在于研究对象上,即研究汉族者为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者为民族学,尽管反映了这种意见提出之时一定的现实情况和部分学者的见解,但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欠妥的。某一项研究在中国属于社会学,到了国外就列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划分方法,不利于国际交流。从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和学科体系的科学性上讲,应当突破过去将对汉族的研究排除在中国民族学之外的成例。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差别,在于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是社会,而侧重于行动;民族学的研究单位是文化的载体——民族群体,而侧重于价值。所以,我们将把中外民族学家(或自称为人类学家)采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

① 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 参见王建民:《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1)。

汉族群体及其文化的著作纳入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范畴。

被部分学者视为一个学科的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较为密切的。早期的一些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与早期的民族学研究活动是很难区分的,其中不少还是民族学家进行的。过去也有人将民族学看作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民俗学则是研究汉族的学科。这种看法虽然未必有理,但亦是部分学者在实际操作中的认识。我们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两者间存在的差异往往表现在:民俗学通常注意民俗事项的一般调查和叙述;民族学则不仅进行田野调查,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理论上的。林惠祥在其著作《民俗学》中指出,民俗学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综合研究的论著和民俗的记载。他认为综合研究卓有见解的论著包括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等,而这些作品正是人们所熟悉的民族学的经典著作。杨成志则认为,在民俗学中存在着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人类学的民俗学家是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检验民俗学材料的。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实际上就是民族学家。同时,在民族学的研究中,并未将研究习俗的部分划出作为民俗学来看。在民族学和民俗学之间,至少在部分学者心中存在着一个模糊阈。事实上两个学科的界限有时更为模糊。杨成志认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开始,是在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历史组之下设立民俗组^①。

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分别从文化和体质两个方面对人类群体进行研究。从理论上来说,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学术潮流的发

^① 广东日报:《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纪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专栏,第34期,1949-01-14。

展趋势,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应当统称为人类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曾经一度置于同一研究机构中,研究者们也不乏两者兼而习之者。特别是在一些两个学科的结合或交叉课题的研究上,两者之间的距离更近。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一身兼二任者。然而,即使从包含分支学科的人类学整体来看,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也毕竟有所不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民族学的发展不可缺少,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未来看,具有进一步加强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过,由于体质人类学本身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过去中国文化又往往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对立起来,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真正组合为同一系统的难度颇大,一时难以完全归于人类学旗下。

许多中国学者对历史学较为熟悉,同时,在民族学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喜欢利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从丰富的史籍中搜集出大量的材料,作出新的解释,是中国民族学的早期主要研究的方向之一。从民族学本身的学科结构上来讲,民族史研究也应该成为其一部分。因而许多中国民族学家也把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民族学有了初步发展之后,许多中国的民族学家为了更好地说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凭借他们相当好的历史学功底,在研究课题中将中国古史中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以稽考和分析,并往往把有关的研究列为卷首。当时被视为新派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者也不乏试图利用民族学的材料和观点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者,此种方法和理论为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气息,为更科学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路。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陆学者进行了社会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探索。尽管存在过于依赖简单进化论构

建历史的倾向，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搜集，却为中国学者在民族学学术风格的建立和延续方面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对于这一问题，应当在研究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时给予特别的注意。台湾、香港和其他华裔学者，也在运用中国文献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第二节 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认识

有人认为，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始终是西方民族学的附庸，甚至提出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民族学仍然是国外民族学的舶来品，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中国民族学是否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假如有特点，这种特点又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应该说是研究中国民族学发展史首先要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力求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是历史时空中的产物。研究民族学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选择不同的立意，研究也有不同的目的。民族学史的研究在有的作者眼中，被视为历史的复原和再现；现代人类学则将学科史看作建构学科理论与方法或加强学科认同的途径。学科史的研究，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但依然应当考虑用何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从国际、尤其是欧美研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展史的著作来看，有些从学者的经历和所提出的思想来窥视理论